

陈聆群 齐毓怡 戴鹏海编

萧友梅音乐文集

作人题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此書乃先生生前所著，其內容豐富，

何以歌之

蕭友梅



责任编辑: 李苍鹰

封面设计: 于文盛

萧友梅音乐文集

陈聆群 齐毓怡 戴鹏海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插页 11 字数 42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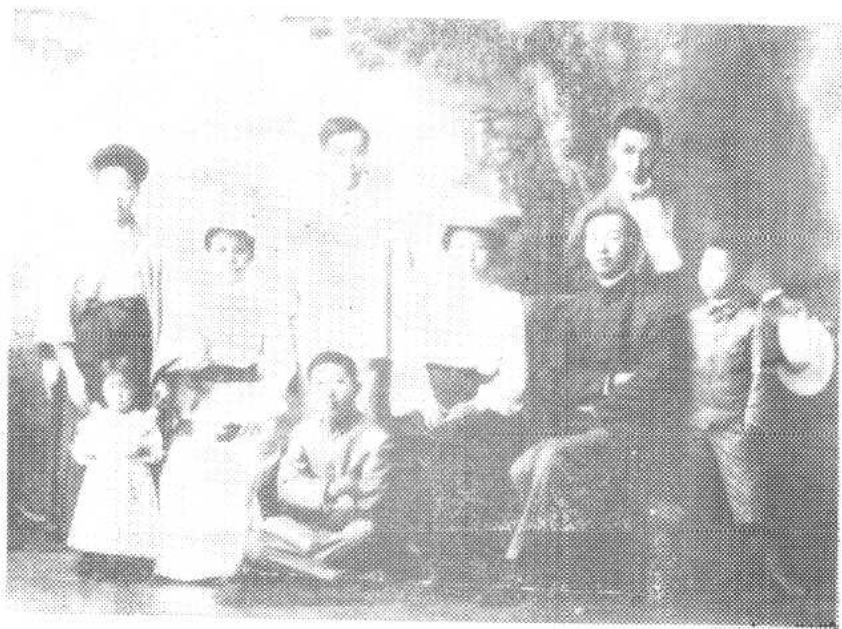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7-80553-254-0/J·215 定价: 16.10 元



蕭友梅



1907 年,萧友梅(右三)与廖仲恺(右五)、何香凝(右七)等合摄于日本东京



1912 年 3 月,萧友梅(前排左一)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府秘书处任职时,与孙中山先生(前排左三)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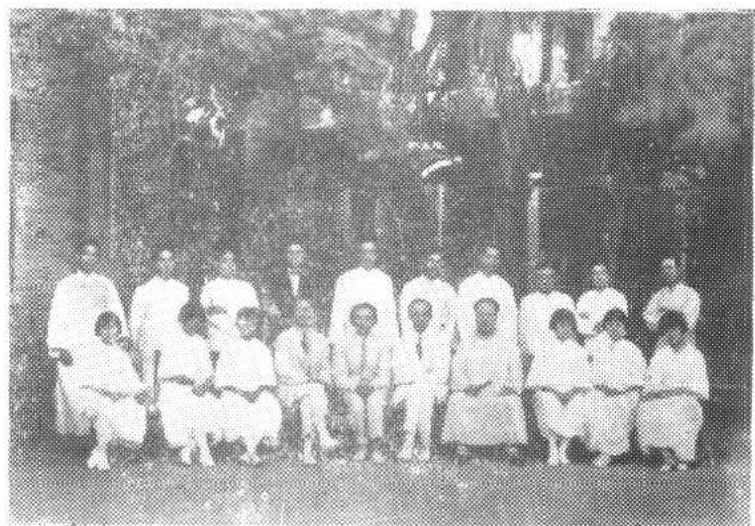


1916 年，萧友梅在德国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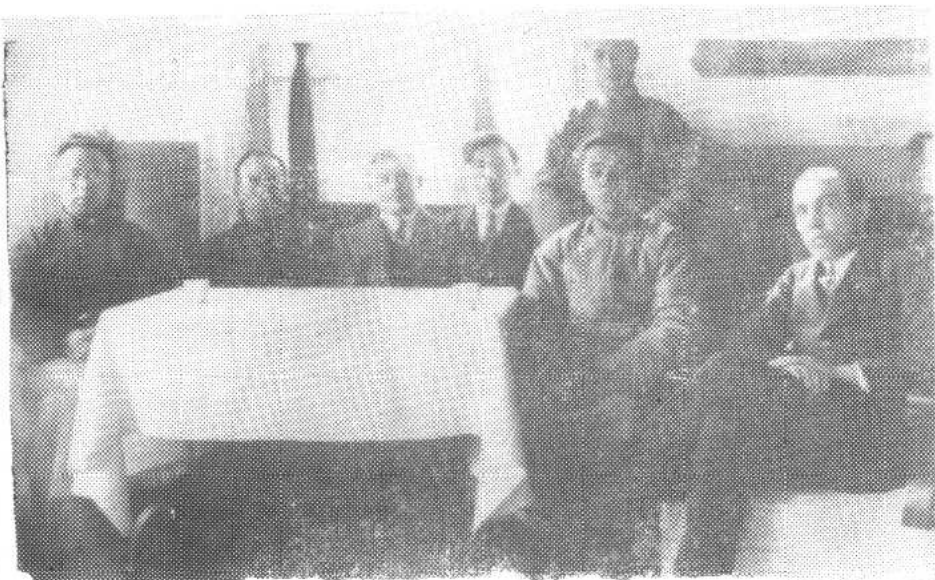


1923 年 11 月，萧友梅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管弦乐队全体队员在该所门前合影

萧友梅（前排左六）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部
分师生合影（后排左六为沈星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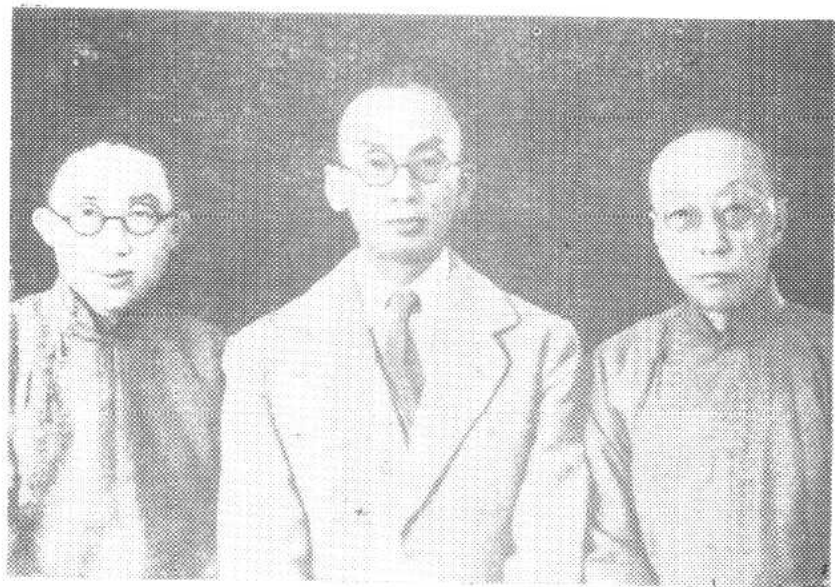


萧友梅(左二)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师刘天华
(左一)、托诺夫(右一)等合影



1926年春，萧友梅摄于北京寓所琴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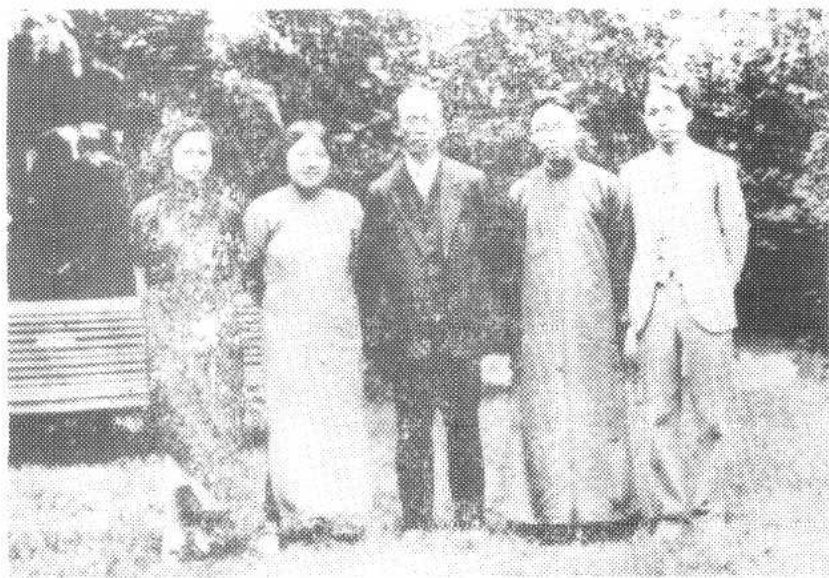
音乐艺文社《音乐杂志》三位主编人合影：
萧友梅(中)、黄自(左)、易韦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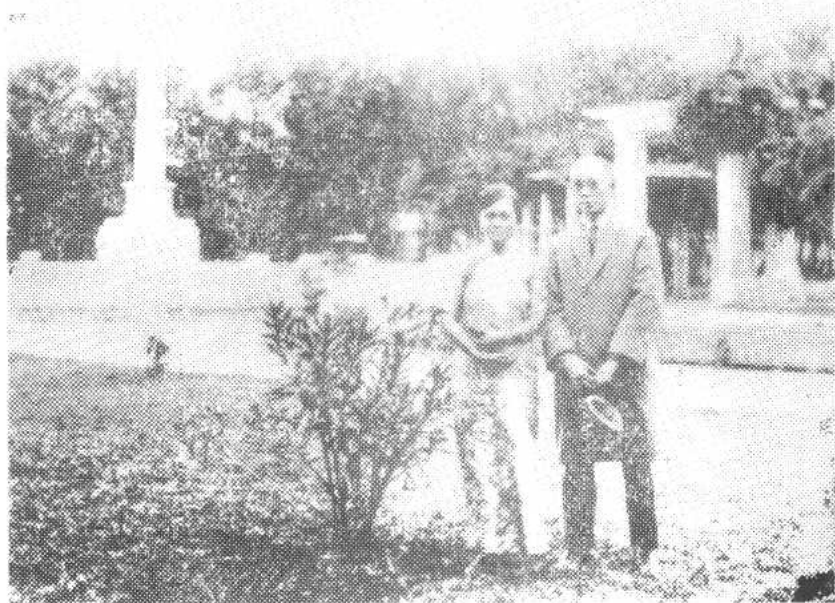
1933年，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音乐艺文社全体
干事合影(前排左三为萧友梅)



1935年9月，萧友梅在新落成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舍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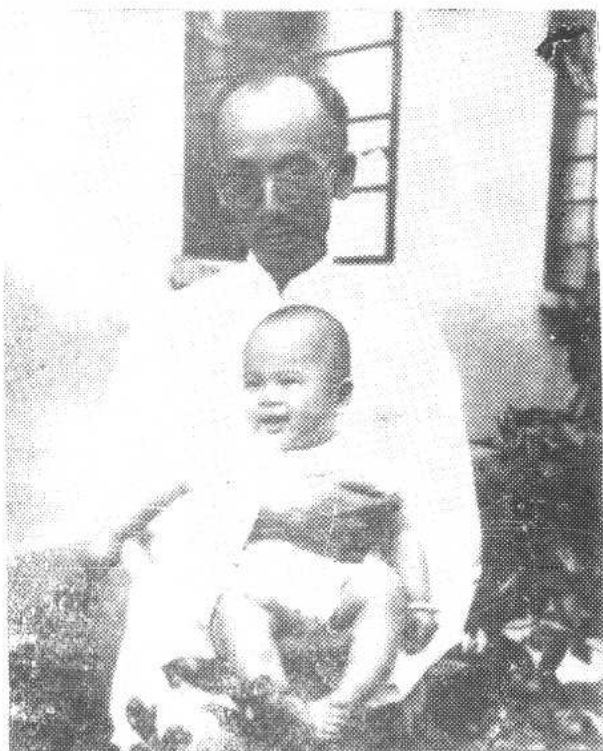


1933年6月，萧友梅（中）、黄自（右二）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李献敏（左一）、喻宜萱（左二）、梁复生（右一）合影



1933 年，萧友梅与夫人戚粹真

1933 年，
萧友梅与儿子萧勤



1931年7月，萧友梅手书履历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 蕭友梅 履歷表

姓名	蕭友梅	籍貫	浙江杭州
出生年月	清光緒二十一年	學歷	上海音樂學院畢業
職業	音樂家	現任	上海音樂學院教授
主要經歷	1.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生於浙江杭州。 2. 1914年入上海聖約翰大學音樂科，師從約翰·黑格（John Black）教授，學習音樂理論及作曲。 3. 1918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獲文學士學位。 4. 1920年入上海音樂學院（當時為上海音樂學堂）學習，師從蕭友梅教授，學習音樂理論及作曲。 5. 1924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獲音樂學士學位。 6. 1925年入上海音樂學院（當時為上海音樂學堂）學習，師從蕭友梅教授，學習音樂理論及作曲。 7. 1928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獲音樂學士學位。 8. 1929年入上海音樂學院（當時為上海音樂學堂）學習，師從蕭友梅教授，學習音樂理論及作曲。 9. 1931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獲音樂學士學位。		

关于国民音乐会的谈话手稿

（以下為手稿內容，文字較為模糊，已盡力辨識）

關於國民音樂會之談話手稿

（一）音樂之重要性

音樂為人類生活之一重要部分，不僅能陶冶情操，更能增進人與人之間之感情。在國民音樂會中，我們應如何發揮音樂之功能，使其成為社會教育之重要工具，實為當前之急務。

（二）國民音樂會之宗旨

國民音樂會之宗旨，在於普及音樂，提高國民之音樂素養。我們應以大眾為對象，提供高品質之音樂演出，使音樂真正走入民間，成為國民生活之一部分。

（三）音樂會之組織與運作

音樂會之組織應力求簡便，運作應力求透明。我們應建立一套完善之管理制度，確保音樂會之順利進行。同時，我們也應加強與社會各界之溝通與合作，共同推動國民音樂會之發展。

（四）音樂會之宣傳與推廣

音樂會之宣傳與推廣，是吸引觀眾之關鍵。我們應利用多種渠道，如報紙、廣播、電視等，進行廣泛之宣傳。同時，我們也應加強與社區、學校等之聯繫，提高音樂會之知名度。

（五）音樂會之未來展望

隨著社會之進步與國民素養之提高，國民音樂會將擁有更廣闊之發展空間。我們應不斷創新，提高演出質量，為觀眾提供更多元化之音樂選擇。同時，我們也應加強國際交流，學習借鑒國外之先進經驗，推動我國國民音樂會之發展。

《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手稿

國史館藏
 六月十日金陵縣學堂呈報各屬之呈、其批云：據此是為久已
 通。今該生不直稱大儒，遂論中飽，全刊職工於今，余固以之事
 無事，以此重斯大業，王呈者，言數年餘如某事，愚雖元真一
 之以為記也。
 夫筆之呈，以江南諸生之家，沈氏之高足，於八國中，一第廣於大
 學，適有少時克石二碑，素以新經受計三職，呈年教生聽李，於是
 之命，故知古事研史，康居者，傳習得之華先生，仍定及之字師
 集何厚，乃是早居之，然見於以京女子高學，昨死，望期上考，件於
 好應光焉，所見則正五年，以其著前身，乃位及與俱在，當時身以

△对于各地国乐团体之希望▽手稿

[illegible]

贺 绿 汀 序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又是无情的。现在出版的《萧友梅音乐文集》，再一次证明这是一条不可辩驳的真理！

多少年来，我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开拓者萧友梅先生被说成是“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民族虚无主义的典型；甚至他和蔡元培先生于1927年共同创建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就是后来的上海音专），也被说成是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粉饰太平的产物，是反对“新音乐”、排斥革命人士、“唯西洋是崇”的“学院派”堡垒。这些观点长期在全国广泛宣传，畅通无阻。似乎“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变成真理”；似乎这样一来，萧先生和他主持的上海音专就果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就理应被打入另册，成为革命音乐的斗争对象。

萧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事实胜于雄辩。他的这部有白纸黑字为凭的音乐文集就足以说明问题。

真实情况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下，他为我国现代音乐文化事业的开创与建设，披荆斩棘，历尽艰难困苦，奋斗终生。他从德国回来以后，便担负我国第一所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的教务。以后到上海主持国立音专工作，他又在极困难的条件下，把极有限的经费绝大部分用在聘请当时第一流的中外音乐教授和付房租、购置图书、乐谱、唱片以及乐器等教学设备方面。当时全校师生虽仅百余人，但教学水平和国外相比也称得上是第一流的。饮水思源，没有萧先生为之含辛茹苦、百般操劳的“老音专”，就不可能有1949年解放后的上海音乐学院，更不可能有目前活跃在国内外，使我国的音乐文化在

世界大放光彩的各方面杰出的音乐人才。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

萧先生是不是一个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的人呢？他在国外学了二十年音乐，但是1916年他向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提交的用德文写作，并且获得博士学位的长达九万余字的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就是一部系统地论述我国古代乐器史的专著。即使是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没有看见过第二部同类的著作。他主持上海音专校务期间，不仅把“国乐”列为专业的课程设置，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一种民族乐器；还亲自教授“旧乐沿革”（就是中国古代音乐史）。萧先生对于欧洲音乐文化，包括它的技术理论，的确十分重视，而且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提倡的。但是他这样做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借鉴，以便更好地创造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新音乐文化。他曾经这样说过：“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干儿，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我们的民族性。”（《音乐家的新生活》）在他看来，“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很明显，萧先生的这些观点，和一味拜倒在西方石榴裙下、仰洋人鼻息的民族虚无主义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此外，萧先生的一些洞察历史、鞭辟入里的论述如：关于“中国音乐的历史也同国家的一般的历史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是国家机构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音乐在政治的、维护统治方面的重要性的见解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使得唐朝的玄宗在皇宫里面亲自为世俗音乐上课，另一方面那些保守的伦理学家却认为世俗音乐的爱护与正宗音乐的忽视必然导致王朝的覆灭”、“中国音乐的爱护和促进不是象西方那样依赖个别杰出的人才，而是（除了某些独奏曲子之外）依赖政府的音乐爱好。而且由于每一个政权都在想方设法断绝与过去的音乐的联系，无论如何要创建新的管弦乐队和乐章，因此也就不难了解，频繁的改变与干扰的结果造成了音乐发展的非常缓慢。另一个与千百

年的历史并不相称的发展的原因也在于整套的孔夫子的原则，它是为中庸之道谆谆告诫而又被那些保守的伦理学家大大发展了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尽管是早在“五四运动”以前的1916年说的，但是他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刻研究和正确态度，不仅和那个时代的反封建精神息息相通，而且即使在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旧不失新鲜感和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面对萧先生说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不能不使那些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居的“权威”们汗颜。

出一本书不容易，出一本好书更不容易。这本集子的编者对于萧友梅先生文稿的收集整理，态度客观求实，工作严肃认真，在校勘、标点、考证、注释方面花费了大量时间，而且做得很过细，从而使这本集子的编辑质量得到了保证。尤其值得感谢的是，廖辅叔先生在他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出于对亡友的一片深情，不辞劳累，不畏酷暑，在去年夏秋时将萧友梅先生的博士论文赶译出来，更是值得敬佩。如果没有他这样一位既精通德语，又对中国古代音乐和文史典籍有很深造诣的学者，萧先生的这篇兼有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专著，恐怕就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和我国的读者见面了。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出：在目前出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上海音乐出版社毅然出版这样一部重要著作，并且自始至终得到萧先生的长子、远在海外的萧勤博士和萧先生的侄女、中央音乐学院萧淑娴教授的热情关注和全力支持，使出书成为现实，这是很值得庆幸的。

明年是萧友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我想，这本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对萧先生最好的纪念，而且通过这本文集，使萧先生的事迹得以重放光彩。这不能不是使后代音乐工作者为之感奋的大事！

陈绿汀

1989年11月16日于上海